

Annual Report of Oversea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6



海外人文社会科学发展 年度报告

2016



■ 武汉大学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研究中心 组编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Annual Report of
Overseas Humanities



海外人文社会科学发展 年度报告

2016



■ 武汉大学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研究中心 组编

■ 韩 进 主编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外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年度报告. 2016/武汉大学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
科学与评价研究中心组编.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7-307-19114-3

I. 海… II. 武… III. 社会科学—研究报告—世界—2016
IV. C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23394 号

责任编辑: 黄金涛

责任校对: 汪欣怡

版式设计: 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37.75 字数: 542 千字 插页: 2

版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9114-3 定价: 135.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海外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年度报告 2016

编 委 会

主 任:韩 进

副主任:骆郁廷

编 委:(以拼音字母为序)

陈曙光	陈 伟	方 卿	丁四新	何其生
李佃来	李 纲	林 曾	马淑杰	秦天宝
单 波	宋 俭	尚永亮	沈壮海	唐皇凤
王 建	邹 薇			

目 录

英语世界的易学研究述评	丁四新 吴晓欣 邹啸宇(1)
2015 年度日本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考察报	尚永亮 汪 超(62)
2015 年西方跨文化传播研究:	
问题与方法	单 波 冯济海(107)
西文秦简牍研究概述	
.....	Marc KALINOWSKI(马克)
.....	VENTURE Olivier (风仪诚)(130)
日本的秦简牍研究	工藤元男 等(165)
韩国的秦简牍研究	尹在硕(234)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与长期增长趋势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综述	
.....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邹 薇 楠 玉(263)
海外环境法前沿问题研究(2015)	秦天宝(309)
国际商事仲裁的热点与前沿:在线仲裁	何其生 王雅茜(376)
全球话语中的“中国模式”	陈曙光(433)
近二十年来美国教育社会学研究的热点论题	
与前沿演进	林 曾 蔡蔚萍(477)
2015 年海外数字出版研究	
进展	方 卿 徐丽芳 徐志武 王 钰 贺钰滢(531)
近十年国内外社会网络研究的知识	
图谱分析	李 纲 詹 星 杜智涛 叶光辉(577)

英语世界的易学研究述评

丁四新 吴晓欣 邹啸宇*

《周易》是我国一部十分重要的经典，不但对中国哲学、思想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在英语世界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据爱德华·海克尔(Edward Hacker)、史蒂夫·摩尔(Steve Moore)以及罗琳·派特斯克(Lorraine Patsco)合编的《〈易经〉文献书目提要》所载，1950年至2000年期间，用英文撰写的易学研究著作、学位论文多达502种，相关论文、书评等也有486篇。^①由此可见20世纪下半叶英语世界《周易》研究的盛况。关于英语世界的易学研究，国内学术界已做了一些概述，甚至有专门的综述和研究著作面世。^②

* 作者简介：丁四新，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国学院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吴晓欣，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邹啸宇，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讲师。本文由邹啸宇搜集资料，吴晓欣、邹啸宇负责综述，丁四新负责审订全文及撰写部分评论。

课题资助：武汉大学海外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年度报告2016研究计划。

① Edward Hacker, Steve Moore, and Lorraine Patsco. *I Ching: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2. 这部书有中文介绍，参见蒋树勇：《〈易经〉文献书目提要——为一门宏大学问所编的书》，《中国索引》2007年第4期。

② 参见杨宏声：《二十世纪西方〈易经〉研究的进展》，《学术月刊》1994年第11期；黄德鲁：《国内外英译〈周易〉的现状与几点建议》，《安阳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吴钧：《论〈易经〉的英译与世界传播》，《周易研究》2011年第1期；赵娟：《问题与视角：西方易学的三种研究路径》，《周易研究》2011年第4期；李伟荣：《英语世界的〈易经〉研究》，2012年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杨平：《〈易经〉在西方的翻译与传播》，《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2015年第6期。

不过，以往的论述主要关注 2000 年以前《周易》在西方的翻译与传播，对于 21 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十年中西方英语世界的易学研究动态，则少有问津。因此，综述近十年来英语世界的易学研究，这是大有必要的。当然，我们的工作不尽于此，在综述的基础上，我们力图作一些简要的评论。这样做的目的，其一，在于比较充分地展示当今西方英语世界的易学研究概况及其贡献；其二，指出其不足，甚至谬陋之处。

一、《周易》在西方英语世界的翻译与传播

西方世界对《周易》真正感兴趣始于 17 世纪来华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代表人物是法国耶稣会士白晋 (Joachim Bouvet, 1656-1730) 和傅圣泽 (Jean-François Foucquet, 1665-1741)。^① 他们致力于寻求《圣经》与传统儒家经典之间的相通性，因而承担着“双重民族化” (Double Domestication) 的使命，即通过传教活动，一方面使《圣经》被更多的中国人了解，另一方面使西方对《易经》的熟悉度有所增加。^② 虽然白晋在莱布尼茨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 沟通六十四卦与二进制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但是在整个十七、十八世纪，《易经》在西方的影响还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当时还处于宗教传播的框架之下，完整的《易经》译本与专门的研究

① 16、17 世纪之际，虽然以利玛窦 (Mattheus Ricci, 1552-1610)、龙华民 (Nicolaus Longobardi, 1559-1654)、艾儒略 (Julius Aleni, 1582-1610) 以及卫匡国 (Martini Martino, 1614-1661) 为代表的意大利传教士对《易经》中诸如“太极之辨”的问题进行过讨论，但此一时期的研究非常有限。利玛窦的弟子、法国传教士金尼阁 (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 曾经把《易经》翻译成拉丁文，但最终散佚。详见杨宏声：《明清之际在华耶稣会士之〈易〉说》，《周易研究》2003 年第 6 期。

② Richard J. Smith. How the *Book of Changes* Arrived in the West. *New England Review*. Vol. 33, No. 1, 2012, pp. 25-26.

究著作极少。^① 不过,到19世纪下半叶,西方世界接连涌现出了多部翻译著作,^②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的《易经》英译本。^③ 这个译本使用得非常广泛,直至20世纪中期仍被视为标准的英语译本。1950年,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1873-1930)的德文《易经》译本被贝恩斯(Cary F. Baynes, 1883-1977)转译成英文本(除了英译本,卫氏本还被转译为意大利语和荷兰语等版本),这个译本取代了理雅各本,成为西方英语世界最为流行的标准《易经》译本。值得一提的是,在翻译的过程中,理雅各本和卫礼贤本均得到了中国学者的帮助,如王韬(1828-1897)曾协助理雅各作翻译,劳乃宣(1843-1921)协助卫礼贤作翻译。这两位中国学者因深谙程朱理学,并深受程颐《程氏易传》和朱熹《周易本义》的影响,从而间接地导致理氏和卫氏本都打上了程朱理学的印记。此外,卫氏还在翻译和注解中加入了荣格心理学的因素,这一点是卫氏译本与理氏译本不同的地方。卫氏英译本第一版以两卷的形式出版,1961年则以一卷的形式再版,1967年出第三版,这一版本在形式上进行了适当调整,并且加入了由卫德明(Hellmut Wilhelm, 1905-1990)写作的序言和一个

① 今存且被后世广泛认可的最早译本是由雷孝思(Jean-Baptiste Regis, 1663-1738)撰作的《〈易经〉:用拉丁文译出的最古老的书籍》(*Y-king, antiquissimus Sinarum liber quem ex latina interpretatione*),但直到1834-1839年期间,才由莫耳(Julius Mohl, 1800-1875)整理成两卷本的形式,在德国斯图加特和蒂宾根两地出版。

② 这些译本有:Canon Thomas McClatchie: *A Translation of the Confucian Yi-king* (1876); Angelo Zottoli: volume 3 of the *Cursus Litteraturae Sinicae neo-missionariis accomodatus* (Cours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ppropriate for New Missionaries) (1880); Paul-Louis-Felix Philastre: *Tscheou Yi* (1885-1893) and Charles de Harlez: *Le Yih-king: texte primitif rétabli, traduit et commenté* (1889). (详见 Richard J. Smith. How the Book of Changes Arrived in the West. *New England Review*. Vol. 33, No. 1, 2012, p. 27)

③ James Legge trans. *The Yi King*, Vol. 5 of *The Sacred Books of China* (*The Texts of Confucianism*). New York: Scribner, 1899.

索引。^①

1. 近十年来的《易经》英译情况

近十年来,《易经》文本的翻译仍然是西方易学研究的关注点。总体来看,《易经》的翻译与研究包括两个大的方面:其一,《易经》文本得到直接英译,且出现了几种视角新颖的翻译;其二,对来华传教士的《易经》译本做研究,其中既有对不同传教士译本的比较研究,也有对传教士译介过程中的某些特点所作的深度阐述。

在这一阶段出现的《易经》英译本数量虽然不多,但是他们都颇富特色,且译者采用了新颖而独特的解读视角。无论是玛格丽特·皮尔森(Margaret J. Pearson)以两性平等的视角对王弼阴阳对待说的反驳,闵福德(John Minford)借用道家内丹学对易道的体认,大卫·辛顿(David Hinton)对《易经》文本的诗意解读,还是史蒂芬·菲尔德(Stephen L. Field)对《周易》作为预测之书的详细阐述,都为《易经》的翻译增添了不少亮丽的色彩。

皮尔森是西方翻译《易经》的第一位女学者。^②皮氏译本的最大特点是以两性平等的视角来解读《易经》,旨在突出女性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她们与占筮活动的关联。首先,皮尔森对翻译的对象作了界定。她认为,后世层出不穷的各种注解遮蔽了《易经》文本的原始内涵,只有摆脱各种《传》、《注》的束缚才能还原《易经》的真正面貌。有鉴于此,她将后出的《易传》文本予以搁置,未作翻译,而直接翻译六十四卦文本,即六十四卦的卦画、卦名、卦辞和爻辞。其次,皮尔森虽然承认王弼《周易注》在易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但是她同时指出,王氏的注解在某种程度上曲解了《易经》的本意,最明显的例子见于王弼对“阴”、“阳”二概念的解释。在王弼看来,卦画中的实线(—)代表阳,虚线(--)代表阴。阳表示力量、善、男性,而阴则与身体、道德上的弱势,或者女性

① Richard Wilhelm and Cary F. Baynes.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 (3th impression of 3th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1970.

② Margaret J. Pearson. *The Original I Ching: An Authentic Translation of the Book of Changes*. Tokyo, Rutland, Singapore: Tuttle Publishing, 2011.

相联系。王弼这种以性别差异来解释阴阳的视角，得到唐代经学家孔颖达的进一步发挥，孔氏甚至认为《易经》中像“大”这一类的词语，一旦应用于女性，就都含有“淫荡”的意思。这种贬低女性的解读方式在中国易学发展史上长期处于支配地位。虽然已有学者注意到这种偏见，但没有对这一问题做系统的考察。皮尔森则将此作为翻译中的核心问题，力图在英译《易经》的过程中揭示其原始旨意，重新审视女性在古代社会中的地位。在方法上，她立足于《易经》原始文本，同时参照《诗经》、《书经》等典籍来作论证。具体来说，在原始的《易经》文本中根本不见“阳”字，而“阴”只在《中孚》九二爻辞（“鸣鹤在阴，其子和之”）中出现过一次。然而，这一“阴”字仅仅交代了鹤巢所在的位置，无法由此判断它是否与性别有关系。由甲骨文等文字可知，“阴”最早的形象是一只鸟或一座山，而《诗经》、《书经》中的“阴”字则指冰窖或者古代君主为亡父守丧的棚舍。因此，她认为，王弼将两种不同的爻画分别称为“阴”与“阳”，完全背离了《易经》的本意。此外，皮尔森认为，出土文献中的某些内容亦可证明女性在古代社会中具有一定的地位，甚至有可能参与了占筮活动。出土帛书《易经》的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墓主是一位女性，这足以证明古代女性与占筮并非处于隔绝的状态。其他一些文献也可以证明，商代贵族出身的女性同样参与了卜筮活动，周代的不少女性还负责解读卜筮的结果。通过以上两个方面的论证，皮尔森克服了男尊女卑的偏见，使得她以两性平等的视角来看待和翻译《易经》的文本。在她看来，只有抛弃阴阳二分这种不合理的观念，才能更加准确地参透《易经》文本的深层意涵。

2014年，英国文学翻译家闵福德历经十二年翻译的《易经》在美国出版。^①这个《易经》译本长达九百多页，主要由两大部分构成，也可以看做两个译本。第一部分是“智慧之书”（Book of Wisdom），包括对《周易》经传（《序卦》和《杂卦》除外，而《系辞》

^① John Minford. *I Ching (Yijing): the Book of Change*. New York: Viking, 2014.

和《说卦》也只选取部分文本，且散入相应的卦中)的文本翻译。在译文各部分的注解中，闵福德列举了中国自汉代以来的相关注解与诗作，同时引用了国外某些翻译家和评论家的见解，最后陈述了自己的看法。第二部分为“青铜器时代的卜卦”(Bronze Age Oracle)，是对伏羲所作六十四卦、文王所作卦辞以及周公所作爻辞的翻译。^①这一部分旨在回归《易经》最初的用途——青铜器时代的占卜手册。每一卦都从廖新田(中国台湾学者)用甲骨文、金文或篆书书写的卦名开始，接下来是他结合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和许思莱(Axel Schuessler)的音韵学著作而对卦名读音的大致拟构。在卦爻辞的译文之后，闵氏还列举了各家不同见解。大致说来，该译本有如下特点：(1)在注解部分，杂列多家解说和观点，这其中既有程颐、朱熹、王夫之等中国古代学者，又有理雅各等西方学者，此外还有陈鼓应等当代学者的观点。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闵福德直言不讳地表示，他最欣赏一个叫做刘一明的注释者。刘一明为全真教派道士，他认为《易经》的符号体现了内丹修身术中的某些阶段，而阅读《易经》就是“探究自然最基本的原则，并且达至生命的真谛”。闵福德认为，《易经》的“真正之道”是无法言说的，而刘一明对自然之道的体认与自己的看法不谋而合，因此闵氏在译本中大量引用了他的观点，这使得其译本具有道家风格；(2)在该书的序言中，闵福德引用陶渊明、孟郊以及阮籍等人的诗作来描述易道的不可言说性，一方面这使得其著作显得丰富多彩，给人一种“诗意”的印象，但是另一方面这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易经》的哲理内涵，而将其放置在通俗的层次上来理解。这一特点主要源于闵福德文学翻译家的身份特征。他自己也说，他的这本译注不是为汉学家或专业学者而写作的，它不是一种学术型的翻译，而是一种经典式的翻译(scriptural translation)；(3)在表达上，闵福德在很多地方加

① 闵福德将“卦辞”翻译为 Hexagram/Oracular Judgment，“彖传”翻译为 On the Judgment，但在用拼音标注名称时，则称“卦辞”为 Tuan，“彖传”为 Tuanzhuan，他没有使用 Guaci 这一名称。(详见 John Minford. Introduction. *I Ching (Yijing): the Book of Change*. New York: Viking, 2014, pp. xiv.

入了拉丁词汇，此外，一者，对于第一、二部分的同一卦名，他部分地采用了不同的翻译；二者，对占筮的实际操作有详细的介绍；等等。

2015年又有两个新的《易经》英译本出版，译者分别为辛顿(David Hinton)和菲尔德(Stephen L. Field)。辛顿的译本非常简短，除去导言和末尾的注释外，主体部分由《易经》文本的翻译和介绍占筮的操作步骤两个部分组成。^①其每一卦的翻译顺序为：卦辞→象→象→爻辞。该译本的主要特点有：(1)突出《易经》文本的诗意特色，辛顿认为，早期阶段关于卦画的解释既原始又神秘，从而使《易经》成为一种深刻的诗性和哲理文本。后世关于《易经》的注解可以看作二次注解，他们以儒家道德为解读视角，为原始文本添加了诸如伦理和政治等层面的意涵，这也促使《易经》成为儒家的重要经典，这一情形同样适用于《诗经》等其他经典文本。然而，深藏在文本中的诗意内涵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磨灭，他们是中国哲学、诗学与绘画等艺术形式得以生发的根源。基于此，辛顿翻译《易经》的出发点就是透过后世的各层注解，直面其诗意的文本内容，和重现存在于原始文本中的抒情化形式；(2)增大了《易经》英译本的解释空间，起源的神秘性决定了这个文本的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神秘的色彩，这也意味着对这一文本作出统一的解读绝非易事。不同的读者，对于这种诗化的文字，完全可能作出不同的理解，而文本所用语法的灵活性也使解释的空间进一步增大。仅《乾卦》卦辞“元亨利贞”，辛顿就举出了五种可能的不同解读方法。以上两点决定了辛顿的译本更像是一部文学作品，其翻译的灵活性和丰富性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过度的“诗意化”也导致《易经》的哲学、政治以及伦理等层面的内涵被遮蔽。辛顿将周公视为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诗人，这样，就从来源上规定了卦爻的诗学特征，不过这忽略了周公作爻辞时的政治背景和考虑。

菲尔德明确地区分了“周易”和“易经”这两个概念。他认为，

^① David Hinton. *I Ching: the Book of Change*.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5.

作为《易经》的祖本，前一概念是指西周早期的统治者创作出来并加以利用的占筮手册，后一概念则将孔子的注解包含在内。^① 菲尔德的目的是，通过对《周易》原始文本的翻译来揭示其创作的时代背景，因此译本的第一部分是“《周易》的起源”。在这一部分，作者首先梳理了从史前文明到周公时代的古代历史及其演变；然后列举了古代的三种卜筮形式 (Portents, Augury 及 Oracles)；接下来从祖先神、伏羲、女娲、八卦的发明以及河图、洛书等方面追溯了《易经》的神秘来源；最后考察了《易经》的作者与命名等问题。译本的第二部分是对六十四卦的翻译和解读。菲尔德以孔子之前的文献资料作为解读《周易》文本的主要参照，希望借此避免各种注解的不利影响，而这些注解使《周易》从一本占筮之书演变为哲理之书。菲尔德译本的主要特点有：(1) 依据卦辞和爻辞的内容为它们分别贴上不同的标签，如征兆 (omen)、策略 (counsel) 或者预测 (prognostication) 等，从而使其在占筮中的功能清晰化；(2) 对每一卦的每一爻都作了注解，从而对文本背后的知识性内容提供了详细的说明，并阐述了隐喻性的语言和技术性的语法。这样，既可以使一般的读者欣赏注解叙述的连贯性，又可以使附录中的汉语文本大受专业人士的欢迎。既然他强调《周易》一书原始的占筮功能，那么菲尔德不可能不对实际的占筮步骤非常关注，因此该译本的第三部分就是讨论《周易》的实际应用。

总之，皮尔森、闵福德和辛顿的《易经》翻译各有优点和缺点，下面主要就他们各自的缺点作一简短的批评。其一，在《易经》翻译的指导思想上，皮尔森使用男女平等 (性别平等) 的观念来解读和翻译《易经》文本，这虽然符合现代价值和观念，并在字面上似乎恢复了它的原意，但是这未必合乎中国古人的观念，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曲解了中国古人的思想。诚然，《易经》在西周至春秋时期没有直接应用阴阳观念，六十四卦文本没有出现“阳”字，“阴”字也仅出现过一次 (表示鹤巢所在的位置)；并且，《易经》被

^① Stephen L. Field. *The Duke of Zhou Changes: A Study and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Zhouyi* 周易. Harrassowitz Verlag; Tra Ant Edition, 2015.

广泛用于贞问男女婚媾的占筮，甚至在春秋后期被某些贵族妇女所熟悉，但是不能由此否定《易经》的存在背景及其在历史性的解释中存在着严重的男女性别差异和歧视。其一，从西周至春秋的封建制、父权制及先秦典籍存在的大量贬损女性的言论来看，应当说彼时对于《易经》的解释很难摆脱性别歧视的观念。其二，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中国古代的筮人和占人均男性，而女性在整个占筮活动中始终处于被解释和决定的状态。据《左传》筮例的记载，有个别女性在春秋后期才开始熟悉《易经》，但她们也只在解释上作了间接的参与。其三，阴阳对待观念的产生和应用有其历史性根源、过程和合理性，这既来源于中国古人对现象世界的概括和提炼，反过来也可以推广于对现象世界的解释。从这一角度看，《易经》文本接受阴阳对待观念的解释乃是迟早的事情。而王弼、孔颖达等人在此基础上对女性作价值贬损性的解释和评价，也是合乎历史实际的。不过，从现代性的角度看，确实应当避免将“阴——女”作固定的搭配，及相应地作所谓天道观的论证，应当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和限定崇阳抑阴的价值解释。皮尔森将对《易经》的解释单纯限定在男女性别是否平等的观念上，这是有很大局限的。其四，顺便指出，皮尔森对于“阴”字的解释是错误的。《说文·雲部》曰：“黔，雲覆日也。”同部又说“𩇑”为“黔”字的省或体。《阜部》曰：“阴（陰），暗也。”甲骨文有“阳（陽）”字，而无“阴（陰）”字。山南有阳光照射故谓之阳，山北受山体障蔽、缺乏阳光照射故谓之阴，这是“阴”字的本意。可知“阴”字，绝非如皮尔森所云，是一只鸟或一座山的象形。其次，从翻译标准来看，闵福德译本具有杂糅的特征，富有个性。他喜好道士刘一明的注释和观点，于是他在译本注释中就大量引用了刘道士的观点，使得注释带有浓厚的道家色彩；他是一个文学翻译家，于是他的翻译带有诗化和通俗化的色彩，有别于学术型的翻译。这反映出，他的《易经》译本带有很强的主观性，不能供学术界使用。最后，辛顿将《易经》看作诗性加哲理的双重文本，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具有意义的；不过，从古到今，中国古人从未将《易经》当作一个诗性的文本来看待；而《易经》常常被当作哲学文本来看待，则是从解释的角度来说的。实际上，正如

朱子所说,“《易》本卜筮之书”,但由于这个文本是由“筮、卦爻、卦名、卦爻辞和解占”构成的,在言、象、意三者之间就会产生解释的复杂性和歧义性,同时为解释的深化提供了可解释的前提条件。所以《易经》本身既不是诗性文本,也不是哲理文本,而是可哲理化解释的文本。

2. 对西方来华传教士《易经》翻译之研究

除了对《易经》或《周易》文本的英译,过去十余年中,西方英语世界还涌现出了不少对西方翻译与传播《易经》之历史过程的研究。其中,既有对理雅各和卫礼贤《易经》译本的比较研究,也有对17世纪、18世纪法国耶稣会士翻译与传播《易经》某些问题的专门研究。

韩子奇(Tze-ki Hon)教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历史系)在《“生生之谓易”:比较理雅各与卫礼贤的〈易经〉翻译》一文中,对西方《易经》翻译史上著名的两位学者——理雅各和卫礼贤做了比较研究。^①韩氏首先指明,比较二者的目的不是为了判定他们在翻译中国典籍时的精确性,而是为了突出他们为西方读者译介中国典籍所体现出的非凡才能和创造力。理雅各和卫礼贤的相同点有:二人都有在中国多年传教的经历;在翻译《易经》的过程中,他们都得到了中国学者的协助;他们都试图利用《易经》解决所处时代面临的各种问题。除了这些相似点之外,两者的不同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一,尽管两者都将《易经》的原始文本(六十四卦的卦辞、爻辞部分)与后来的注解(《十翼》)相分离,但侧重点有所不同。理雅各将《十翼》作为附录来处理,认为六十四卦是文王和周公建立新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历史记录,其中的原理对于维多利亚时期的英格兰同样适用。而卫礼贤则非常看重《十翼》,认为孔子将《易经》从占筮之书转变为一部哲理之书,其贡献远胜文王和周公。对于《系辞》中的宇宙生成论,理雅各完全无法理解,而卫礼贤则赞同宇宙是在阴阳

^① Tze-ki Hon. Constancy in Change: A Comparison of James Legge's and Richard Wilhelm's Interpretations of the *Yijing*. *Monumenta Serica*. Vol. 53 (2005), pp. 315-336.

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出来的。其二，理雅各认为，作为历史文献，六十四卦必须按照他们在《易经》中的排列顺序来阅读。而卫礼贤则认为，只要读者利用《易经》来反思人生，六十四卦的阅读顺序就可以任意调整。其三，理雅各强调卦与卦之间的内在联系，而卫礼贤则认为每一卦都是单独的个体，且都体现了《易经》所谓“变”的原则。当然，对于二人翻译中的局限性，韩氏也予以论及。一者，理雅各以六十四卦中的前十卦为例，论明《易经》是对西周历史的记录，但是在韩氏看来，此后五十四卦的卦画并不符合这一特征。再者，当面对包含丰富宇宙论的《十翼》，尤其是《系辞》时，理雅各的观点所面临的困境更加突出，这即是基督教上帝存在的观点使理雅各无法接受儒家的宇宙论。而卫礼贤关于东西方的严格二元区分，在韩子奇看来，可能与当今流行的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相背离，但在卫氏所处的时代，它却是挑战欧洲中心主义的一个有效途径。

德国学者柯兰霓 (Claudia von Collani) 对法国耶稣会士白晋及其创立的“索隐派” (Figurism) 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她以 18 世纪法国传教士与《易经》的相遇为切入点，研究这些传教士如何将《易经》翻译为拉丁文的问题，及白晋用拉丁文写作的有关《易经》的文献等，由此从宏观上把握索隐派在中西方的形成、发展和衰落的过程，并对“中国礼仪之争”这一历史事件及来华耶稣会士各团体之间的交流与斗争等做了客观的还原。^① 在此基础上，柯兰霓首先梳理了 17 世纪、18 世纪来华传教士研习中国经典的历史，列举多位传教士及其与中国经典的关联，其次论述了所谓中国礼仪之争以及《易经》在此阶段的遭遇，最后清理了索隐派的《易经》研究。柯兰霓首次将白晋《易经大意》 (*Idea Generalis Doctrinae libri Ye Kin*) 的完整本、白氏的信件及手稿等集合起来，加以刊印。《易经大意》长

① Claudia von Collani. The First Encounter of the West with the *Yijing*: Introduction to the Edition of Letters and Latin Translations by French Jesuit from the 18th Century. *Monumenta Serica*. Vol. 55 (2007), pp. 227-387.

久以来被误认为是白晋对其中文手稿《古今敬天鉴》^①(*De Cultu Celesti Sinarum Veterum et Modernorum*)所作的双语注解,柯兰霓对该文献的研究旨在消除这一误解。为了与索隐派相抗衡,法国反索隐派的耶稣会士雷孝思将《易经》译成了拉丁文本,它是现存最早的拉丁文《易经》。柯兰霓在本文的另一个关注点即是雷孝思的拉丁文本《易经》。总之,柯兰霓的相关研究,对于全面了解《易经》在西方的传播过程及其历史是有积极意义的,值得高度重视。长期以来,卫礼贤译本的巨大成功也带来了一个负面影响,即很多人误以为《易经》在西方的流传始于20世纪,而遗忘了它曾经在18世纪受到了法国耶稣会士的高度重视。

与柯兰霓有所不同,魏伶珈(Wei, Sophie Ling-chia)的博士学位论文《耶稣会传教士〈易经〉语内翻译中的跨文本对话》则主要研究了耶稣会索隐派写作的关于《易经》的中文著作。^② 仅在1710至1712的三年间,白晋用中文撰写了八部关于《易经》的论著。索隐派借助翻译、解读以《易经》为代表的中国经典著作来寻找中西方之间的互通性,并试图使天主教在中国国教化。这一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他们对中西方经典中的数字、图象等的比较,仍然值得继续关注。其中,他们的中文手稿因包含丰富的相关内容,理应得到人们的重视。魏氏的研究目的,是通过发掘索隐派被遗忘的中文著作来全面探讨18世纪《易经》在西方传播的特点。而这,对于了解索隐派的易学研究理路具有重要的作用。

总之,韩子奇、柯兰霓和魏玲佳的研究是非常有益的,对于我们深入认识理雅各和卫礼贤译本的区别,弄清耶稣会士白晋及其建立的索隐派的《易经》研究是有很大帮助的。三氏的研究非常扎实,

① 中国学者如徐宗泽、郑安德以及刘耘华等,在关于明清之际耶稣会士的资料汇编或研究著作中,均对《古今敬天鉴》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和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的李强在其硕士学位论文《〈古今敬天鉴〉抄本研究》(2014年)中对该著的研究状况进行了详细介绍,可参看。

② Wei, Sophie Ling-chia. *Trans-textual Dialogue in the Jesuit Missionary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of the Yijing*.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fended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15.